

“伊巴丹学派”沉浮录：记田野中的一次对话

李连星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尼日利亚

背景

在选择研究对象国田野调查的合作院校时，我几乎毫不犹豫就将伊巴丹大学作为第一目的地。伊巴丹大学不仅在学术上处于尼日利亚的领先地位，更重要的是在整个非洲大陆和历史学界都有着“伊巴丹学派”的名声。这象征着非洲学者曾经在知识生产的本土化过程中所做出的重要努力和成果，是一种与西方知识霸权抗衡的突出表现。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今，这个学派的发展与现状对于我这样一个非西方也非非洲的“非洲学人”来说，依旧充满魅力。它会告诉我非洲在全球发展中处于被动地位时，其知识生产又会面临怎样的挑战，而作为一名非洲研究者，又当以什么样的身份来开展研究。所以在本次田野调查中，除了自己研究的课题外，在伊巴丹大学感受“伊巴丹学派”就成了另一主要目的。



图1 伊巴丹大学大门 作者拍摄

“伊巴丹学派”的前世

The Ibadan School of History was not territorially limited; its flame blazed across nations and continents. —Michael Omolewa.

我到达伊巴丹大学时，正值该校建校70周年，校内外贴满了庆祝的条幅和海报，上面醒目的标注了校庆的主题“70年的卓越”（70 Years of Excellence）。对于这个学校在过去70年中所培养出来的各领域人才和有影响力的思想家自不必多说，但伊巴丹这个名字之所以在尼日利亚，整个非洲，甚至整个学术界能有一席之地，与其在历史学中“伊巴丹学派”的建立和发展不无关系。我所在的系所是社会科学学院下的政治学系，与独立前建立且影响深远的历史系不同，它并没有所谓的一个学派的诞生，但几乎与我交流过的每一位学者都能清楚的阐述“伊巴丹学派”的内容和意义。可以说这个学派的存在和发展对于这个学校的学者来说具有一种精神上的引导意义。



图2 70周年校庆海报 作者拍摄

1848年以前，尼日利亚本土有少数学校在教授历史学科，在仅有的学科教学中，几乎所有的内容都是关于英国人或者欧洲人探索非洲的故事，可以说当时的非洲史是一门事实上的“英国史”或者“欧洲史”。这些来自欧洲的思想大家和历史学家就声称非洲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大陆，他们认为只有有了文字的记载，历史才有了意义，而非洲在殖民时期之前相关的文字史料是几乎缺失的，所以这是一块历史空白和黑暗的大陆。当Kenneth Onwuka Dike教授在50年

代接手伊巴丹大学历史系的时候，他强调非洲史应基于一种非洲人的视角来研究，并且在方法论上有了重大突破：他认为口述史在记录非洲历史的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此外，Dike教授和其他第一代尼日利亚历史学人还积极投身于历史学科的结构建立、创建历史学学会和学术刊物，以及吸引更多年轻人投入到历史的学习中来。这就是“伊巴丹学派”的由来。总体来说，“伊巴丹学派”的本质就是希望打破殖民时期在非洲历史学中知识生产的霸权，以非洲人的视角看待非洲、研究非洲。

“你知道的，这种现象不是只有历史学科里存在，每一个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在这种枷锁之下”，政治系讲师Arowosegbe在与我的第一次对话中，情绪高涨的给我解读完他眼中的“伊巴丹学派”之后，着重向我强调了这一观点。他的担忧并不只是存在于上个世纪，直至今日，很多来自非洲的学者都在抱怨非洲研究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利益、西方扩张、西方需求、西方标准、西方认识论和西方学者影响的结果，也一直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一直到今天，西方非洲研究不仅依旧从非洲本身获取知识，而且还决定了哪些非洲议题应该成为世界范围内的讨论对象。上个世纪90年代，当越来越多的非洲学者参与到全球非洲研究中来时，一些西方学者还认为这种现象将使这个学科“贫民窟化”。而现在非洲学者的身影也因为各种现实原因越来越少的出现在国际研讨会上，所以Arowosegbe激动地告诉我关于非洲问题研究的各种学科的去殖民化几乎从未实现过。



图3 我所在的社会科学学院 作者拍摄

“伊巴丹学派”的今生

曾经关于非洲是否有历史这个问题的争论，是西方知识生产霸权对非洲历史或者历史学科的一种否定，更是对非洲本身能够进行自我思想创造和知识生产的全盘否定，并通过殖民的方式来强化这种否定。

因为殖民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干预手段，能够让本土空间、时间和自我治理的概念完全瓦解，而制造出一种新的传统，从而使西方概念神圣化，并保持绝对权威和优越性。

所以在很多场景下，非洲本土思想和学术一直在殖民的束缚下被外部化，非洲思想几乎毫不批判地接受了外来范式、概念和方法论，而这些非本土产生的内容简单化并垄断了非洲学术。虽然非洲学者清醒地意识到西方对世界的想象仅仅只是西方的想象，远非普世性想象，但他们依旧对曾经和现在的知识殖民无可奈何。

对此，Arowosegbe遗憾地说道：“与独立后第一代和第二代学者不同，现在的很多本土学者已经不再把以非洲为中心的知识生产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而是产生了更多的咨询文化。他们不是为了知识生产本身而研究，也不为了经济发展和工业转型研究，而是为了获取证书和寻求不同岗位的任命而研究。”

与面对来自西方这种外部权利结构不平衡引起的威胁不同，现在的非洲学者也面临着来自国家内部的压力。不论是经济的衰落，亦或是政治层面的压力，都已经导致大量人才流失，力量开始变得分散。更为严重的是学术界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身份政治，非洲国家学者也拥有着较为复杂的社会身份，如民族、宗教、语言和地区等。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如国家安全、发展、贫困等等，研究者甚至会丢弃更宽泛也更重要的国家公民身份而为狭窄的个人身份而研究发声。他指了指伊巴丹大学校园中心的清真寺和教堂，告诉我这些本该是体现这个国家宗教和平相处、人民融合的标志，但是现如今的尼日利亚学界，各个地区的大学逐渐被本土学者控制，对非本地、本民族或者本宗教的学生和学者不包容，政策严重倾斜，知识生产成为封闭的政治进程。而讽刺的是，清真寺和教堂的旁边就是当年Dike教授为了更好的研究尼日利亚史而推动建立的国家档案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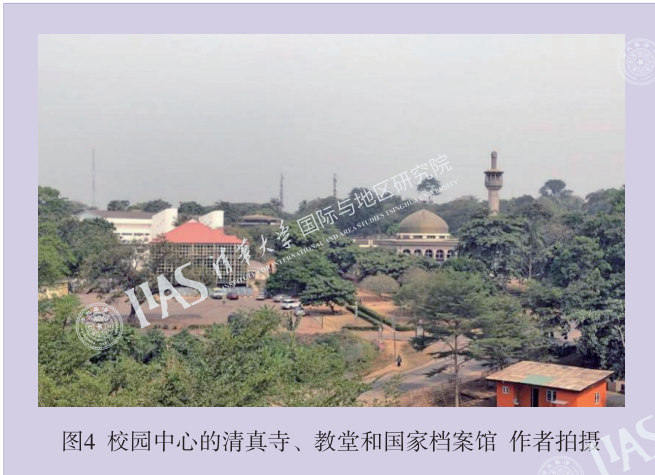


图4 校园中心的清真寺、教堂和国家档案馆 作者拍摄

后 记

在Arowosegbe的眼里，失去自我身份定位和初心，是一个悲伤却不可避免的结局。因为非洲的知识生产仿佛进入了一个无法破除的死循环，不论基于非洲视角看非洲和研究非洲的渴求有多么热烈，由于所使用的方法和理论来自于西方世界，这好像就是用禁锢住你的枷锁来破除枷锁本身，整个过程变得无力且无效。

面对此种困境，我对我来到伊巴丹大学的意义以及作为一名研究非洲的中国学生的价值，有了更积极的看法。在主动寻找自我身份这个过程中，我又明朗了许多。所以，在面对他和系里的其他老师问我的第一个问题——作为该系接待的第一个中国博士生，我为何来到伊巴丹大学政治系学习时，我的答案也逐渐清晰起来。我希望我的研究能够更加以非洲的视角和非洲的关切为出发点，通过对我自身身份、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审视，来完成我的博士课题。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建立与当地学术机构和人员的联系，在现在或者是未来，创造更多的合作研究机会，努力去破除这种知识生产的枷锁。